

防返贫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农户 可持续生计能力研究

张吉岗^{a,b} 杨红娟^a 吴嘉莘^{a1}

(昆明理工大学:a. 管理与经济学院, 昆明 650093;b. 城市学院, 昆明 650051)

【摘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后, 少数民族地区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仍不在少数, 防返贫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着力解决的课题, 而提高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是防返贫的关键。文章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成果: 一是定义可持续生计能力并构建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二是运用S曲线解释可持续生计能力与防返贫的逻辑关系。三是从宏观统计数据视角和农户感知视角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能力的现状, 发现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生计胜任能力等方面均存在短板。四是根据福格行为模型设计提升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总体框架并提出具体策略。研究成果对少数民族地区防返贫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关键词】: 防返贫 少数民族地区 农户 可持续生计能力 提升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912(2022)05-0079-10

2021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 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精准扶贫理念为全球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智慧和方案。但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消除绝对贫困仅是贫困治理的阶段性胜利, 从“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目标到2035年远景目标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还有较长的路要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013)认为贫困最终并不是收入问题, 而是一个无法获得最低限度需要的能力问题^[1]。胡伦和陆迁(2019)研究发现生计能力作为“自我发展能力”外在表现, 其在农户持续贫困生成及脱贫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郑宝华和宋媛(2020)在总结扶贫成效基础上, 发现贫困具有典型的可行发展能力贫困特征, 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3]。少数民族地区自然条件差、经济基础弱、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广。虽然现行标准下绝大部分贫困农户已实现脱贫, 但从实际情况看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仍不在少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防返贫将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少数民族地区需要着力解决的课题, 也是同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的基本前提。因此, 研究可持续生计能力并解决实际问题对防止少数民族地区农户返贫具有较高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文献回顾与评述

作者简介: 张吉岗(1984-), 男, 山东聊城人,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昆明理工大学城市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 杨红娟(1966-), 女, 云南大理人,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及管理; 吴嘉莘(1996-), 女, 黑龙江哈尔滨人,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可持续发展及管理。
基金项目: 教育部规划基金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农户生计能力持续提升的动力机制研究”(20XJJA630002), 项目负责人: 杨红娟;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后农户生计资本的重构影响机理及提升策略研究—以云南为例”(72064025), 项目负责人: 杨红娟; 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防返贫视角下三区三州农户内生动力持续提升机制研究”(YB2020051), 项目负责人: 张吉岗

(一) 文献回顾

顾名思义, 可持续生计能力是可持续理念和能力理论在生计范畴的延伸, 故文章围绕生计概念、可持续生计、能力理论、生计能力等四方面对已有文献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一是生计概念方面。《辞海》对“生计”一词有多重释义, 解释为“谋生之道”最符合研究的主题。通俗讲, 生计是指赖以生存的手段。消除贫困的语境下, 生计的定义普遍认为源于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992)等撰写的工作论文, 即生计包括用以谋生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资源与社会资源)和活动^[4]。弗兰克·埃利斯(Frank Ellis, 2000)则把获得资产的权利也纳入生计范围, 并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5]。二是可持续生计方面。1987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布研究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 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即人类的发展和愿望的满足必须限制在不对环境破坏的基础上^[6]。发展与环境的逻辑关系由发展如何影响环境转变为环境承载力对发展的重大影响。然而, 贫困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 发展是解决贫困的唯一途径。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UNCED)将可持续发展引入行动议程, 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推向行动^[7]。1995年, 哥本哈根世界首脑会议(WSSD)和北京世界妇女大会(FWCW), 均把消除贫困作为大会主题之一, 明确提出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解决贫困问题^[8,9]。上述三次会议的召开意味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延伸到贫困治理领域。赵曼和张广科(2009)^[10]总结了可持续生计的定义: 个人或家庭所拥有和获得的、能用于谋生和改善长远生活状况的资产、能力和有收入活动的集合。因此, 具体到个体或家庭层面, 可持续的内涵转变为满足贫困群体生存需求的持久性。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 多个机构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开发了系统性分析方法, 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2000年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11]。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贫困人口为主要研究对象, 在脆弱性背景、制度和政策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下, 贫困人口综合利用五种生计资本, 选择可行的生计策略, 最终实现生计目标。三是能力理论方面。一般认为, 能力总是与人们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紧密联系, 离开特定目标, 无法评价或提升人的能力。戴维·麦克利兰(David C Mc Clelland, 1973)是较早关注个体能力的学者, 提出了“胜任力”素质模型, 该模型将个体的能力素质比喻成漂浮在海洋平面的冰山, 裸露的冰山部分包括知识、技能, 是外在的, 易测量的能力素质, 可以通过培训来改变和发展; 深藏在海平面以下的冰山包括社会角色、自我形象、特质和动机, 是内在的、不易测量的能力素质, 且难以评价和改变^[12]。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2013)在亚里士多德关于生活质量和亚当斯密关于生活必需品论述的基础上, 突破狭隘发展理念的束缚, 创造性地提出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点, 认为个人的实质性自由可以理解为一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的“可行能力”, 而“可行能力”是指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的组合。功能性活动即包括衣食住行, 也包括政治权利、选择机会等活动^[1]。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 2018)认为, 消除贫困, 归根结底是消除贫困人口发挥其自身价值所面临的重重障碍, 为贫困人口提供机会^[13]。四是生计能力方面。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 1992)等强调生计能力是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并概括为个人和家庭应对胁迫和冲击的能力, 以及感知机会的能力^[4]。梅丽莎·里奇(Melissa Leach, 1999)等认为生计能力是人们在活动中完成生计行为的权利与获得结果^[14]。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可行能力是国内学者研究生计能力的主要理论基础。丁士军(2016)、胡伦(2019)、刘伟(2019)等均在研究中将生计资产视为生计能力的核心, 认为生计能力可以通过生计资本予以测度或表征^[2,15,16]。张峻豪和何家军(2014)融合了可持续生计和可行能力两种理论, 构建了贫困群体能力再造分析框架^[17]。

(二) 文献评述

国内外学者在生计、可持续生计、能力等方面的研究日臻完善, 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详实的理论支撑和前期基础。但可持续生计能力不是以上内容的简单替代或叠加。第一, 生计能力是可持续生计的核心范畴已达成普遍共识, 然而, 何为生计能力尚未明确定义。国内学者用生计资本来测度或表征生计能力, 但生计资本不等同于生计能力, 生计资本只能部分体现生计能力, 不能反映生计能力整体。第二, 胜任力素质模型中知识、技能对提高农户生计能力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是农户改变生计状况的重要手段, 深藏在海平面以下的素质除动机外更适用于高层次的人力资源管理, 与农户现有的或能达到的不相符。第三, 阿玛蒂亚·森以实质性自由拓宽了贫困的范畴, 但其提出的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保证、防护性保障五种工具性自由是对生计能力影响的外部因素, 并不是生计能力本身。与消除狭隘的贫困相比, 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更适用于解决广义的贫困, 且没有列出可行能力的实体清单, 操作层面也存在难题。第四, 从归因理论视角, 解决贫困问题还应考虑内生动力和生计风险。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 2018)等认为穷人需要拥有更多的技能和更强的意志力才能为自己家人的未来提供保障^[18]。《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贫困不应仅从物质资源的匮乏上找原因, 还需要从贫困主体的主观思维上加以认识^[19]。何仁

伟、李光勤和刘邵权(2017)认为可持续生计扶贫理念下, 激发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是关键^[20]。傅安国、张再生和郑剑虹等(2020)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了内生动力的重要性, 认为中国扶贫语境下, 内生动力是世代贫困个体得以脱贫的核心心理资源^[21]。左停、李卓和赵梦媛(2019)从文化视角剖析了减贫与内生动力的关系^[22]。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 1986)系统论述了风险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形态^[23]。陈传波和丁士军(2003)研究发现生计风险可以减弱农户的生计能力^[24]。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1)提出风险与脆弱性是贫困的核心根源^[25]。左停、苏武峥和赵梦媛(2020)认为应对农民生计系统的风险与脆弱性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之一^[26]。因此, 可持续生计能力还应包括内生动力和风险应对能力。

二、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构建

中国扶贫语境下, 生计能力需遵循适应性、多维性、可操作性、持续性、系统性的原则。适应性要求生计能力的定义与分析框的构建必须与中国政治制度、国家战略以及脱贫进程等相适应。多维性是指生计能力是多方面的, 至少应包括基本生活、生计胜任、抵御风险等能力。可操作性要求基于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提出的措施必须切实可行。持续性是为不断改善生计状况和生计目标以及适应环境的变化必须不断地提高生计能力。系统性是指生计能力不是孤立存在的, 必须置于环境中分析, 且要将生计能力转换为生计行为才能实现生计目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 充分考虑以上原则, 认为可持续生计能力是在机会与威胁共存的环境中, 以内生动力为核心驱动, 通过生计行为持续实现生计目标的能力。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是围绕定义阐释构成要素的核心内涵, 如图 1 所示。

该框架满足五个方面的影响机制。第一、机会和威胁是农户生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环境因素。机会主要反映政府供给能力的强弱和供给的公平程度, 产业发展状况决定了当地的就业带动能力和财政收入水平, 而就业能力是供给能力的核心, 财政收入水平又决定着政策支撑力度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制度环境是保障供给公平性的最重要的法宝。为官者不谋私利, 平等的对待每个贫困家庭, 全心全意为百姓谋幸福是最重要的制度环境。威胁主要是农户面临的生计风险, 诸如自然灾害、生病、年老失能等。第二, 内生动力反映了农户的价值观、愿景、行动力, 可通过自我发展意愿体现出来, 自我发展意愿越强的农户更容易摆脱贫困。内生动力即是生计能力的构成部分, 又是其他生计能力提升的动力。因此, 内生动力是生计能力的核心。第三、生计能力至少包括基本生活能力、生计胜任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基本生活能力是较为低级的能力, 比如汉语水平、日常生活能力等, 这些能力对于农户, 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农户尚不完全具备, 直接导致农户与现代社会脱节, 将自己封闭在贫困圈内的可能; 生计胜任能力主要是指农户无论是搞特色种植、养殖、外出务工、APP 软件的应用等何种生计都必须具备的胜任能力; 抵御风险能力是应对威胁冲击而需具备的能力, 而购买保险是提高抵御风险能力最有效的生计行为。第四, 生计行为是连接生计能力和生计目标的纽带, 只有将生计能力转化为生计行为才能实现生计目标。生计目标的实现又让农户更有获得感, 从而付诸于生计行为的意愿更加强烈, 农户为实现更高的生计目标又需要不断提升生计能力, 从而使农户生计进入良性循环。第五、生计目标具有多样性, 但提高收入是生计目标的核心, 阿玛蒂亚·森^[1]也不否认低收入确实是造成贫困生活很强的诱发条件。唯有收入提高才能更好地解决衣食住行, 为子女创造更好的教育条件进而阻断代际贫困传递, 也为年老失能后的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生活得更自由、体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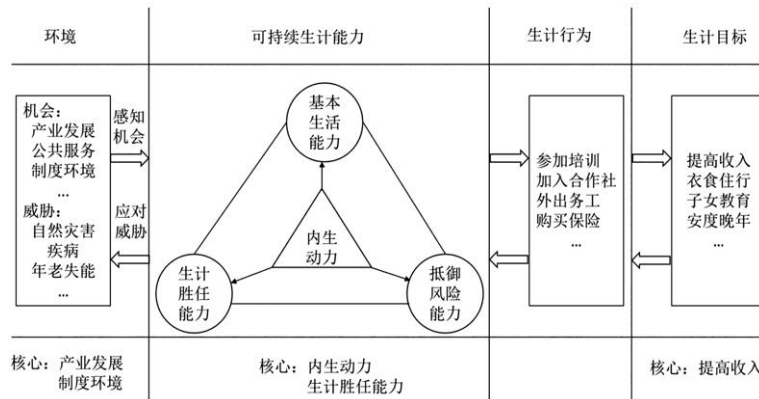


图 1 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

三、可持续生计能力与防返贫的逻辑关系分析

贫困陷阱源于经济学家对贫困治理的一种观点，是指由于经济中存在恶性循环，而使发展中国家陷于贫困落后之中难以摆脱。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2018) 等用 S 曲线形象地描绘了收入与贫困陷阱的逻辑关系^[18]。收入属于生计目标的核心范畴，生计能力是决定收入水平的关键环节。文章借鉴其描绘的 S 曲线^[18]，结合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特征，阐述农户生计能力与防返贫的逻辑关系。如图 2 所示，农户生计能力经过慢速提高、加速提高、变化速率加快、速度逐渐变慢四个阶段，最后趋于稳定，呈 S 曲线形状，对角线表示当前的生计能力与未来生计能力一致。农户生计能力在脱贫攻坚战以前属于慢速提高阶段，在脱贫攻坚战中是加速提高阶段，达到图 2 中的 B 点，代表的是当前的生计能力，P 点代表的是刚好具备实现基本脱贫标准的能力。扶贫结束后，农户未来的生计能力若由 B 点移至 P 点以下，则说明农户脱贫的质量不高，仍以输血为主，造血功能不足，生计能力不可持续，农户的生计能力将陷入恶性循环，进而掉入贫困陷阱。扶贫结束后，农户未来的生计能力若由 B 点逐步移至 R 点，R 点代表的是农户能够达到的较强且稳定的生计能力，则说明农户脱贫质量高，以造血功能为主，生计能力具有可持续性，农户生计能力进入良性循环，跳出贫困陷阱。对于一个地区，整体脱贫后，特别是摘帽摘政策后，返贫率明显上升或反弹，说明整个地区脱贫质量不高。因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是“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必须持续提高生计能力，使其生计能力由 B 点上移到稳定阶段，永久跳出贫困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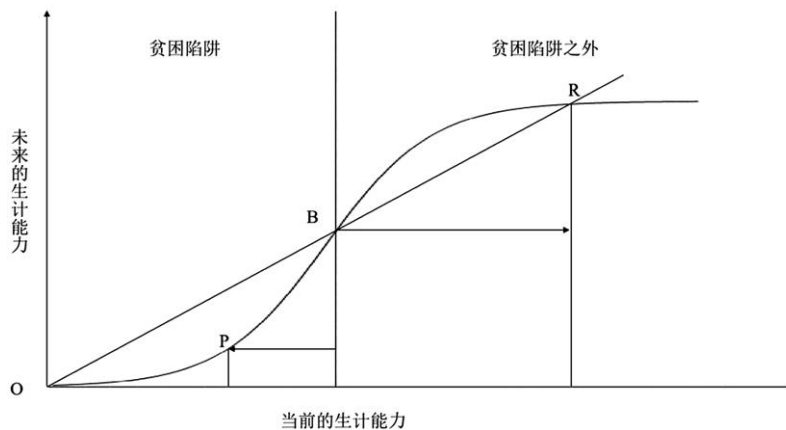


图 2 可持续生计能力与防返贫的逻辑关系

四、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能力现状分析

选择迪庆州为研究区域，以可持续生计能力分析框架为基础，从宏观统计数据 and 微观调查数据两方面分析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能力的现状。迪庆州主要少数民族为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千人以上的少数民族还包括彝族、白族、普米族、苗族、回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89%。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下辖的 3 个县(市)均为深度贫困地区，147 个贫困村，贫困人口约为 7.4 万，贫困发生率为 22%，是典型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2020 年迪庆州实现整州脱贫，贫困发生率降为 0.53%。宏观统计数据来源于国家和迪庆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微观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

(一) 宏观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现状

1. 产业发展现状。

迪庆州地区生产总值从 2015 年的 161.1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251.2 亿元，三次产业比例由 6.7：34.9：58.4 调整为 6.17：37.91：55.92。迪庆州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发展速度较快，但人均水平仍然较低。2015-2019 年迪庆州的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维持在 9.5% 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然而，截至 2019 年人均生产总值为 61697 元，比全国人均值仍低 12.97 个百分点。二是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但总体质量不高。一次产业仍是以传统种(植)养殖业为主，且将投入产出效率低的初级产品直接供给到市场，仅有少量的食用油精深加工产业。二次产业以电力、矿产、水泥等资源型产业为主，过度依赖自然资源禀赋，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几乎为零，产业带动就业能力有限。三次产业占比较高，但以旅游业为主，高端服务业也几乎为零。旅游业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和区域性，辐射范围和受益群体有限，且更容易受新冠疫情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冲击。三是规模以上企业少，产业竞争力不足。2019 年末主营业务收入在 2000 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仅有 28 户，且分布在不同行业，尚未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2. 收入现状。

收入水平是生计目标的核心，也最能直接反映脱贫程度。迪庆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15 年的 6487 元提高到 2019 年的 9446 元，年均增长率 7.8%。同一时期，全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1422 元提高到 16021 元，年均增长率 7.0%，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7655 元提高到 11567 元，年均增长率 8.6%，如图 3 所示。可以发现迪庆州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低于全国贫困地区平均水平，并且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绝对差距从 2015 年的 4935 元扩大到 2019 年的 6575 元；与全国贫困地区平均水平相比，绝对差距从 2015 年的 1168 元扩大到 2019 年的 2121 元。因此，作为典型的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地区，迪庆州贫困农户面临较大的返贫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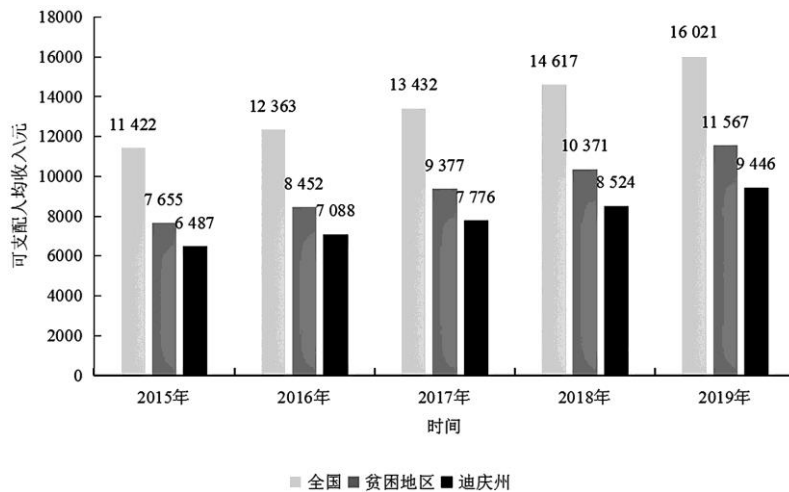


图 3 2015-2019 年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感知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现状

调查问卷借鉴了吴胜涛、祝卓宏和张建新(2009)编制的贫困归因量表^[27]。该表基于归因理论设置，共有个人负担、社会制度、地理环境、个人能力、个人品质五个维度和 17 个项目构成，采用 6 点计分(1=极不赞同，……,6=极其赞同)。本文修订了贫困归因量表，删除与生计能力不相关和经初步测试后信度不高的内容，如“因为买(盖)房子花了太多钱”、“因为家里要供养孩子上学，学费负担太重”等，在产业扶贫背景下增加了“村里扶贫产业效益不好”“因为当地企业太少，打工难”两个项目。修正后的量表重新划分为农户生计胜任能力、农户内生动力、产业发展、制度环境四个维度，有 10 个项目构成，具体如表 1 所示。

本次调查对象为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诺西村的农户，诺西村以藏族居民为主，下辖 12 个村民小组，共 633 户，3337 人。

本次以户为单位填写问卷，共发放问卷 618 份，收回有效问卷 407 份。运用 SPSS 软件对贫困归因量表的信度进行测试，量表总体的 Cronbach α 信度系数为 0.702, 分量表的信度系数介于 0.716~0.884 之间，说明修正后的贫困归因量表可靠性较好。文章采用均值判断农户生计能力现状，结果显示，四个维度层面的得分均值排序为生计胜任能力>产业发展>内生动力>制度环境。特别是制度环境两个项目的均值接近临界值 3, 说明在反腐倡廉大背景下该外部因素对生计能力的影响较小。项目层面，排在前五位的关键词是“无技能”、“文化水平低”、“打工难”、“缺乏闯劲”、“扶贫产业效益不好”，说明少数民族地区农户摆脱贫困既要提升个人基本能力和内生动力、又要提供发展机会。

表 1 感知视角下农户生计能力现状

维度	信度	项目	均值	标准差
生计胜任能力	0.884	没有一技之长	4.767	1.140
		上学太少，文化水平低	4.762	1.172
内生动力	0.716	社会关系简单，支持力度有限	3.500	1.055
		缺乏穷则思变的闯劲儿	4.264	1.393
		运气不好	3.53	1.068
制度环境	0.730	存在以权谋私现象	3.155	1.303
		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足	3.084	1.265
产业发展	0.796	地方偏僻，交通不便，消息闭塞	4.219	1.273
		村里扶贫产业效益不理想	4.224	1.130
		当地企业少，打工难	4.428	1.267

五、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的提升

(一) 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总体框架

福格(BJFogg, 2009)认为个体实施某种行为必须具备动机(Motivation)、能力(Ability)和触发点(Trigger)三要素，公式表达为：行为=动机+能力+触发点。行为者一旦具备足够的动机和能力，当达到触发点时行为得以产生^[28]。该模型提出后被广泛应用到产品营销与推广领域，随着对该理论的认识不断深入，被拓宽到农户行为的研究领域^[29]。福格模型在农户行为应用研究过程中要关注：一是行为不是动机、能力、触发点三要素的简单相加，是“扶贫+扶志+扶智”激发个体动机，提升生计能力，并加速触发点产生，从而形成可持续性防返贫行为。二是在福格模型中，弱动机低能力者是无法被产生有效触发，也就无法产生行为。但在中国贫困治理中，弱动机低能力者若措施得当也会被触发进而产生行为。因此，福格模型应用到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研究中，可认为农户内生动力影响生计能力，借助外部机会转化为生计行为。并将农户划分为四种类型，即强动力强能力、强动力低能力、弱动力强能力、弱动力低能力，根据不同类型提出应对策略，从而构建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总体框架，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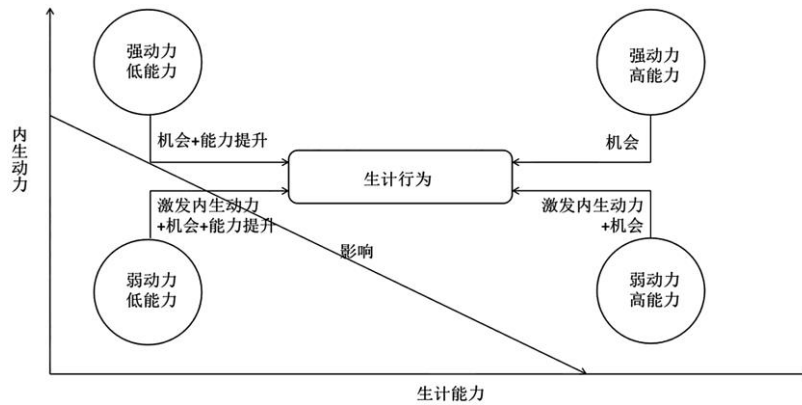


图 4 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总体框架

(二) 农户可持续生计能力提升策略

少数民族地区农户生计能力提升三要素是激发内生动力、提供发展机会、提高生计胜任能力。因此采取的主要策略一是激发农户内生动力；二是转变发展理念创造机会，特别是助力发展产业提供就业机会；三是通过培训切实提高农户生计胜任能力。

1. 激发内生动力。

一是杜绝“等靠要”不正之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等靠要”思想抑制内生动力。脱贫攻坚战中，不少农户认为自己努力也富裕不了多少，还不如悠闲的生活，反正是有政府兜底。部分地方对贫困户特别是建档立卡户在子女上学、医疗、房屋改建等方面的政策倾斜程度远超出基本的“三保障”范畴，吊高了不少贫困户的胃口，争当贫困户屡见不鲜，违背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基本原则，进一步助长了“等靠要”不正之风。脱贫摘帽后，政府应守住帮扶底线，切忌盲目吊高胃口，杜绝出现福利陷阱和悬崖效应，防止弱化农户内生动力。二是打破守旧观念，形成良性竞争氛围。少数民族地区多数农户仍处在农耕文明阶段，固守农村是安身之处，农业是立命之本的观念。改变现状对外界知之甚少的少数民族农户来说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失败的风险又会将这种思维扼杀在萌芽状态。要打破守旧观念，遴选小部分农户，通过技能培训让这部分农户开展特色种植业、养殖业或外出务工，一旦受益，羊群效应显现，其他农户自我发展的主动性会大幅提高。同时，以家族或邻里为单位成立“比拼赶超帮”小组，小组与各成员分别制定明确的年度奋斗目标，小组之间相互较劲，相互比拼，组内成员相互监督、相互帮扶，形成良性竞争氛围。年终村一级对各小组总体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考核，小组对成员目标实现程度进行考核，通过张榜公示给予农户一种外部压力，激发其内生动力。三是树立典型，以榜样倒逼内生动力。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 jit Banerjee, 2018)等认为“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性的改变的可能性”^[18]。部分少数民族农户认为，没有关系和门路，不认识有钱有势的人，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很难改变贫穷的命运。生活既然不能发生本质的变化，就活在当下，不考虑未来。请脱贫致富典型现身说法，宣讲他们是怎么干的，收入和衣食住行达到了什么水平，为孩子提供了哪些更优质的教育，如何孝敬父母等实际问题，让农户充分意识到差距，不能安于现状，并让其懂得只要苦干实干，依靠双手一定能拔掉穷根，日积月累生活定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勤奋不仅让自己活得有尊严和价值，也为子女做出表率，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2. 转变发展理念。

一是切实转变发展理念，形成内生发展机制。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是区域全面发展由“恶性循环”转为“良性循环”的内生机制。个别贫困地区的主政者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不足，视野格局不够，认为当地既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资源，也没有消费市场，发展产业不现实，不如对口帮扶或者上级财政转移支付来得快。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 1991)认为资源基础对于发展的作用不宜过分看重，几个发达的工业经济国家，如丹麦、瑞典、和日本，其工业主要是建立在进口原材料的基

础上^[30]。因此,主政者要敢于担当,有所作为,务必清醒地认识到依靠对口帮扶、财政转移支付不是长久之计,唯有创出一条适合本地区的发展路子,才能实质性地摆脱贫困。实践证明,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不是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要素,而是发展理念。二是正确认识“两山”理念,用好“生态”这张牌。留住绿水青山不是停止发展,而是在环境承载力范围之内发展,向绿水青山要经济效益,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少数民族地区应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优势,科学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生态种养业,培育一批生态农产品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最大限度地通过一次产业提高留守农户收入,增加就地就业的机会。三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精准招商引资。脱贫攻坚战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水、电、互联网等基础设施得到明显改善,但尚未达到产业发展所需水平。特别是铁路、高速公路建设滞后,成为制约产业发展的最大短板。少数民族地区应以工业园区为支撑点,集中财政力量投入到产业发展所需的基础设施,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筑巢引凤提供坚实的软硬件保障。少数民族地区尚不具备发展“高精尖”产业的基础,招商引资切忌好高骛远,应依托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抓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机遇,承接一批东部转移的环境友好、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型企业,打造成某一行业或领域的产业高地,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本地就业机会。否则,随着其它地区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相对优势越来越弱,或者是发展产业可供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小。

3. 提高农户生计胜任能力。

一是优化财政支出,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迪庆州为例,迪庆州作为三区三州深度扶贫开发地区之一,没有技工院校,也没有公共实训基地,仅有职业培训站7所。公共培训供给能力薄弱,严重影响了职业技能培训的开展。同时,师资力量匮乏也是影响技能培训质量的突出短板。因此,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应以节约成本、满足实际需求为指导原则,打造集技能培训、技能鉴定(考试)、人力资源开发市场(劳务输出市场)三位一体的多功能培训中心。实现就地培训、就地鉴定、就地输出的目标。二是创新培训模式,供给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脱贫攻坚战中,对农户的培训多采取政府主导、农户参与的模式,职能部门为完成上级制定的目标和任务,只能采取强制措施开展培训,培训过程流于形式。有补贴的培训,农户多是为了领取补贴而参与,没有补贴的培训,职能部门只能强制农户参与,出工不出力的情形普遍存在。因此,要由“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农户参与模式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农户主导、政府参与的模式,即技能培训由供给导向转变为需求导向。农户根据现实需要主动向技能培训中心或社会培训机构购买服务,或者政府根据用工需求委托第三方组织培训,农户自行决定是否参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发放补贴。三是不唯证书,突出效益导向。培训的最终目标是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并实现就业。随着国家新工种目录的颁布,职能部门可实施的培训工种大幅缩减。这些工种对农户受教育水平要求较高,而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仍然偏低,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相对较弱,加上培训周期普遍较短,导致培训无法真正提升农户的技能水平。同时,职能部门能够实施的培训工种与当地就业实际需求的技能不匹配,进一步加深培训的供需矛盾。因此,政府对技能培训的补贴范围应突破职业技能目录的制约,不唯证书,以农户切实掌握技能并带来收益为导向。对于种(植)养殖技术,培训地点和培训师资还应下沉到农村,让技术走出实验室,走进田间地头,将科技成果落在大地上。

参考文献:

[1]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贇,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胡伦,陆迁.生计能力对农户持续性贫困门槛值的影响[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5):78-87,169-170.

[3]郑宝华,宋媛.未来农村扶贫需以提升可行发展能力为方向[J].云南社会科学,2020(03):65-74,187.

[4]CHAMBERS R.CONWAY G.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Practical concepts for the 21st century,IDS Discussion Paper 296[R].Brighton: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1992.

[5]ELLIS F.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
- [6] 蒋伟.《我们共同的未来》简介[J]. 城市环境与城市生态, 1988(01):46-47.
- [7] 牛文元.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论[M]. 北京: 科学出版社出版, 2007.
- [8] 《北京宣言》-1995年9月15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J]. 中国妇运, 1995(11):3-4.
- [9] 苏惠民. 迎接贫困的挑战—联合国哥本哈根首脑会议[J]. 世界知识, 1995(05):24-25.
- [10] 赵曼, 张广科. 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及其制度需求[J]. 财政研究, 2009(08):36-38.
- [11]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45-56.
- [12] MCCLELLAND D C.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J].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3, 28(1):1-14.
- [13] 穆罕默德·尤努斯. 普惠金融改变世界[M]. 陈文, 陈少毅, 郭长冬, 等, 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8.
- [14] LEACH M, MEARNNS R, SCOONES I. Environmental entitlements: dynamics and institutions in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2):225-247.
- [15] 丁士军, 张银银, 马志雄. 被征地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的改进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06):25-34, 110-111.
- [16] 刘伟, 黎洁. 提升或损伤?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生计能力的影响 [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 2019, 24(03):210-218.
- [17] 张峻豪, 何家军. 能力再造: 可持续生计的能力范式及其理论建构 [J]. 湖北社会科学, 2014(09):41-47.
- [18] 阿比吉特·班纳吉, 埃斯特·迪弗洛. 贫穷的本质. 景芳,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 [19] 世界银行. 2015年世界发展报告: 思维、社会与行为 [M]. 胡光宇, 赵冰, 等,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20] 何仁伟, 李光勤, 刘邵权, 等. 可持续生计视角下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研究综述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7, 27(11):69-85.
- [21] 傅安国, 张再生, 郑剑虹, 等. 脱贫内生动力机制的质性探究 [J]. 心理学报, 2020, 52(01):66-81, 86-91.
- [22] 左停, 李卓, 赵梦媛. 少数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减贫与发展的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文化视角的分析 [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9(06):85-91.
- [23] BECK U. Risk Society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6:45-48.
- [24] 陈传波, 丁士军. 对农户风险及其处理策略的分析 [J]. 中国农村经济, 2003(11):66-71.

-
- [25]WOR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00/2001:attacking poverty[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6]左停, 苏武峥, 赵梦媛. 提升抗逆力: 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民生计系统“风险-脆弱性”应对策略研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04):129-136, 178-179.
- [27]吴胜涛, 祝卓宏, 张建新. 农民工的应对方式、传统人格与贫困归因风格[J]. 中华行为医学与脑科学杂志, 2009(10):930-932.
- [28]FOGG B J. A behavior model for persuasive design[C]//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ersuasive Technology, California, USA, April 26-29, 2009.
- [29]薛彩霞, 姚顺波. 基于 Fogg 行为模型的农民亲环境行为培育探讨[J]. 中国农业教育, 2020, 21(01):71-80.
- [30]冈纳·缪尔达尔. 世界贫困的挑战: 世界反贫困大纲[M]. 顾朝阳, 张海红, 高晓宇, 等,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1.